

## 从“社会协同理论”到“欧洲梦”

——读《跨文化对话·18辑》

周文彬

近代以来,人类文化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18世纪,这就是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现代性的建立。现代性使理性代替了天启,科学代替了宗教,民族国家代替了教会,民主代替了专制。但是现代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最大成就是使科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人权、民主、法治得到了伸张。但是就在现代性仍在发展和扩张时,它的弊端也日益显露了出来,诸如生态的破坏、人际的荒漠、战争的频繁、技术的奴役等等,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于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后现代思潮应运而生,对现代性予以反省和批判,开启了新一轮文化转型的序幕。如今,这场文化转型的声势越来越大,即便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也响起了现代性的警钟。如我国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等等口号和决策,都是对于现代性反思的产物。由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对话·18辑》为我们带来了国际国内关于这场人类文化转型的一些新的思考,其中特别是关于“社会协同理论”和“欧洲梦”的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而这两个问题也是该书的重点。

社会协同理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所有管理共同利益的机制的总称,它的任务是更好地发挥这些机制的功能,更好地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以解决人类社会面对的一系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国际化、多极化、多层化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协同理论提出过三个重要概念:一是旨在建立新型管理方式的“企业治理”,它以企业内部权力互动为基础,尤其重视股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

平衡；二是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善治”概念，它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实行必要的体制改革，使公共事物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具有可预见性；三是以整合国际社会为总体目标的“全球治理”，它首先要在世界多边关系中建立新的调控方式。

很显然，社会协同理论的产生是以欧洲人文主义为背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它同时也是民主思想的普及、企业管理的变革，是从“科学征服自然”到公民“征服科学”的历程。更可喜的是，从现实上来说，欧洲联盟成了协同理论的实验室。在那里，如何建立一个多极权力体系而又不使多样性导致混乱无序的这个协同理论的难题得到了尝试。欧盟一方面通过建立共同市场，消除成员国之间的战争隐患，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另一方面，使不同的政治实体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力量的增长和竞争的结果是只有赢家没有输家。当然，欧洲协同理论的实践并非没有问题，特别是欧盟最终是超越各成员国的合众国，还是仍保持各主权国自主的联盟，这是一个有待继续实践的问题。但是，社会协同理论使当年康德提出的“世界永久和平”问题提上了人类的议事日程，这毕竟是令人鼓舞的。

正是协同理论的发展，使美国学者里夫金于2004年写出了一本题为《欧洲梦》的颇为引人注目的著作。里夫金的“欧洲梦”是处处对比于“美国梦”，强调的是“共同体中的相互依赖而不是个体的独立自主；强调文化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强调生活质量而不是财富积累；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投入的享受而不是疯狂的苦干；强调普遍权利和自然权利而不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总之，欧洲梦追求的不是拼命扩大财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平，不是追求扩大权力范围而是去扩大人类互相理解。欧洲梦被认为是欧洲的第二次启蒙，它是用新的精神主义去打倒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和绝对化的个人主义，是纠正整个现代性的各种错误、特别是反对最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美国文化这一以拼命消费为特征的“寻死文化”。

看来，欧洲梦追求的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而欧洲人的政治目标首先就是保护这种生活方式。这就使生活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而使政治变得敏感和复杂化了。不难看出，欧洲梦其实是一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同美国梦一样，它的不可以普遍化在欧洲地区以外看得非常清楚：它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欧洲品质而抵挡美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是为了保护欧洲福利制度而试图抵挡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方式。

不过，正如我们在介绍协同理论时曾说过的那样，欧洲梦倒可以看做一个试图调和各种不同意见和利益的新模型。它首先承认“多样性”是无法改变的事

实，从积极方面承认多样性，这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和对话理性。但是，当我们想到多样性同时也是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时，欧洲梦能否圆满地成为现实，则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此外，本书还包括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的《全球化的本土化与文化遗产——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一文，它提出全球化的两种模式：一方面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同义词，另一方面全球化就是不同文化感受性的相互切近，对西方人来说，是承认不同文化形式及其发展道路之间需要相互接触和理解，因而从哲学上来说，西方垄断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高宣扬的《莫兰对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反思》一文，介绍了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埃德加·莫兰以其个人亲身经历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苏联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阐明当代一切危机知识论根源及其思想逻辑的基础，这就是自封真理并号称有能力保障人类对自然的中心控制地位的理性知识。他由此出发，对现代政治、社会制度、道德、文学、艺术、管理及教育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现代教育制度是现代知识得以疯狂肆虐而使危机恶性循环和变本加厉地危害全球的关键中介环节。柳鸣九、钱林森的《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则介绍了法国思想家萨特于20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过程和原因。这些都是与现代性的反省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有关的问题。

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不同，文化的类型也就不同。现代性的历史表明，人类自身既是人类的救星，又是人类危及自身的根源；人类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反省和批判。我们相信，人类文化经过现代性的发展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和纠正，能够促进人类建立更适合自身的生活方式。而这就意味着，人类在全面发展自身的道路上就能够大大地前进一步。